

二元对立的符号化呈现——基于“左右”象征的跨文化研究

王婷婷

新疆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 中国·新疆 乌鲁木齐 830017

摘要: 本研究以“左右”象征符号系统作为核心研究对象, 通过结构主义的分析路径, 采用跨文化比较的方法, 从结构功能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双重视角, 论证二元对立范式不仅是人类普遍认知的深层结构, 更是权力关系与文化实践共同形塑的历史构型。本研究旨在揭示结构主义范式在处理文化差异时面临的解释困境。为此, 研究提出需将历史过程论与跨文化比较引入理论框架, 通过历时性与共时性分析的辩证统一, 构建更具解释力的跨文化研究范式。

关键词: 左右对立; 象征; 跨文化比较

The Symbolic Representation of Binary Oppositions: A Cross-Cultural Study Based on the "Left-Right" Symbolism

Wang Tingting

School of History and Society, Xinjiang Normal University, China Xinjiang Urumqi 830017

Abstract: This study takes the symbolic system of "left-right" as its core subject, employing a structuralist analytical approach and cross-cultural comparative methods to argue that the binary opposition paradigm not only constitutes a fundamental structure underlying universal human cognition but also represents a historical configuration jointly shaped by power relations and cultural practices. The research aims to reveal the interpretive challenges inherent in the structuralist paradigm when addressing cultural differences. To this end, it proposes integrating historical process theory with cross-cultural comparison into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and establishing a more explanatory cross-cultural research paradigm through the dialectical integration of diachronic and synchronic analysis.

Keywords: Left-right opposition; Symbolism; Cross-cultural comparison

0 引言

左右二元对立作为文化符号系统与认知图式, 在象征人类学中占据核心。其贯穿文化的历时演进与共时结构, 通过极性象征意义编码形成社会规训秩序, 渗透于仪式、物质文化与语言, 是解析文化深层结构的关键工具。国外对左右二元对立的研究起步较早, 成果丰硕。法国人类学家赫兹在 1909 年发表的《右手的优越: 一项关于宗教极性的研究》中, 对左右二元对立的象征意义进行了开创性研究。他揭示了右手作为“神圣能指”的文化普遍性, 指出右手通常与神圣、尊贵、积极等概念相关联, 左手则与世俗、低贱、消极等概念相联系, 这种象征关系是社会价值观和集体意识的体现。例如, 在许多宗教仪式中, 右手被用于执行重要的仪式动作, 而左手则被视为不洁而避免使用。利奇运用结构主义分析法, 在神话-仪式复合体中解码其作为“文化逻辑算子”推动意义生产的功能。例如,

在某些神话故事中, 左右分别代表着不同的力量或价值观念, 它们之间的冲突和平衡推动着故事的发展。

国内象征人类学的研究起步于 20 世纪 80 年代, 随着国外象征人类学著作的译介, 国内学者开始关注并运用象征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本土文化现象。葛兰言的“时空象征交互理论”影响显著, 其揭示中国礼仪中左右象征的“阴阳五行”动态反转机制, 但存在忽视民族文化异质性、哲学形塑作用及物质文化符号解读的局限。庄孔韶通过黄村民族志, 揭示左右象征在地方权力网络中的实践形态; 何星亮是探究自然物在不同文化语境中的象征意义, 解析其在自然神祭祀中的人神沟通功能。研究面临理论整合性危机与跨文化比较表层化的双重挑战。需以实践理论构建“结构-实践”辩证模型, 并采用“多点民族志”追溯象征在文化接触地带的动态变异, 将其置于权力-知识谱系与文化认同政治框架下阐释。

1 左右二元对立的观念阐释

1.1 概念阐释

在结构主义理论体系中,二元对立(binary opposition)作为核心分析范式,本质上是人类认知架构中二分法思维模式的符号化投射。依据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人类学理论框架,这种思维机制通过构建二元符号系统,将现实世界的复杂经验进行结构化转译,从而生成可被理解的意义系统。从语言符号学视角来看,诸如“黑白”“男女”等遵循差异生成原则,其语义边界的确定依赖于符号间既对立又互补的辩证关系——正是通过这种相互否定与界定的过程,符号的意义得以明确。这种符号对立机制不仅构成了语言系统的深层语法结构,更延伸为人类文化意义建构的底层逻辑。在象征人类学的研究视域下,文化本质上可被视为由象征符号网络编织而成的意义诠释体系。其中,二元对立作为符号组织的基础法则,承担着意义编码与价值分层的关键功能。通过深入解析善恶、神圣世俗、自然文化等核心二元范畴,研究者得以穿透文化表象,揭示特定社会中宇宙观、社会秩序及意识形态的深层建构逻辑。值得关注的是,左右二元对立作为空间符号系统的典型代表,兼具生物空间属性与文化建构特征的双重维度。

左右方位的原始划分源于人类具身认知对空间的方向性切割。然而在文化符号化进程中,这组空间概念逐渐演变为承载性别意识形态、权力等级及价值判断的象征载体。在诸多文化实践中,左常与阴性特质、从属地位相联结,右则指向阳性特质与主导权威,这种符号赋值模式与性别社会建构及身体政治存在深层勾连。相较于其他静态二元关系,左右对立展现出显著的文化变异性与历史动态性:在历时维度上,其象征意义伴随社会结构变迁与观念范式转换经历符号重构;在共时维度中,不同文化接触区域的差异导致象征编码的多元分化。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例,其礼仪空间中的左右尊卑体系,在周礼制度的规范、阴阳五行学说的形塑及皇权意识形态的影响下,形成独特的空间象征语法,并在不同历史阶段呈现出等级规则的适应性调整。鉴于象征意义对语境的强依赖性,研究者需综合运用文化相对主义视角与历史化分析方法,将左右二元对立置于权力-知识谱系、文化传播网络及社会实践场域的多维框架中,通过多维度符号解码,方能全面揭示其复杂的文化意涵。

1.2 相关理论基础

结构主义理论为理解左右二元对立提供了重要的分析框架。结构主义认为,人类的思维和文化是由一系列深层

结构所决定的,这些深层结构通过各种文化现象表现出来。二元对立是结构主义理论中的核心概念,被认为是人类思维的基本结构之一。这种认知二元性作为人类思维的结构,广泛渗透于神话学、语言人类学及亲属制度研究等多个领域,具体表现为生死、天地、男女等极性符号对的普遍存在。列维·斯特劳斯在其神话分析中明确指出,这些对立元素通过结构重组机制,共同构建起叙事深层结构,本质上是文化对自然与社会秩序进行符号化编码的过程。

从象征人类学的研究视角出发,左右二元对立构成了空间符号系统的核心维度,其象征赋值过程与特定文化的宇宙观、权力结构及价值体系紧密交织。在社会符号学层面,西方文化中“右尊左卑”的符号等级制度,借助宗教仪轨与日常惯习的双重文化濡化作用,将“右”编码为神圣能指(如基督教文化中“上帝之手”的象征意涵),而“左”则被赋予不洁符码。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左右象征体系遵循阴阳五行关联性思维,在礼仪空间中构建起“左阳右阴”的动态平衡结构,其符号意义会随时空语境(如季节变换、方位差异)发生语义反转,充分彰显了文化相对主义的典型特征。

文化相对论强调文化的多样性和相对性,认为不同文化都有其自身的价值和意义,不能以一种文化的标准去评判另一种文化。不同文化对左右的象征赋予存在巨大差异,这是由各自的历史、地理、宗教、社会结构等多种因素所决定的。在西方基督教文化中,右手常与上帝的祝福和神圣力量相关联,左手则有时被视为与邪恶、不洁有关;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左象征着阳、尊贵、吉祥,右象征着阴、卑微、不祥。这些差异反映了不同文化的独特价值观和信仰体系。在历时性研究维度,研究者需重点关注左右象征的符号变迁机制。以中国历史为例,明清时期礼教强化,使得左右等级象征从单纯的礼仪符号逐渐演变为皇权符号,这一过程充分体现了社会结构转型对符号系统的形塑作用。文化相对论警示我们应避免文化中心主义偏见,深入特定文化的意义之网,基于地方性知识的语境,解释左右对立的实践逻辑。

2 左右二元对立的象征意象分析

2.1 自然界中的左右象征

自然界中诸如日升日落、河流左右岸等空间方向性现象,构成了人类文化认知图式的核心符号。其中,太阳的东-西运行轨迹尤为关键,作为宇宙论核心符号,其空间方位编码本质上是人类运用关联性思维,对自然节律进行文化翻译的结果。以中国古代月令文化为例,东方被有

机纳入阴阳五行符号系统,被赋予阳气生发场域的特殊意义。这种将季节、方位与生命相联结的认知模型,在《礼记·月令》“东风解冻”的记载中得以具象化呈现,进而形成了生态仪式链的认知根基,深刻影响着传统社会的时间与空间观念建构。在汉文化宇宙观体系内,东方作为生命本源象征,其符号意义生产紧密关联农耕文明的生态适配。古人通过观察日出方位与作物生长周期的内在联系,经仪式实践将其转化为社稷崇拜符号。而在基督教文化语境中,东方的启示性象征源于救赎叙事传统。《圣经》中“东方三博士”追寻星象朝拜耶稣的记载,将空间方位转化为神圣时间锚点,构建起独特的地理空间神圣化模型。

在传统阴阳二元体系中,西方被标定为阴气汇聚区,这种死亡隐喻与自然界秋收冬藏的节律形成符号同构。在基督教艺术的“末日西方叙事”中,借助光暗对立符号系统,日落方位被建构为世俗性终结符码,充分体现了神圣或世俗二元划分的深层认知结构。自然界中的左右二元对立现象,如太阳的东升西落、河流的左右岸等,在不同文化中被赋予了丰富多样的象征意义。这些象征意义并非随意产生,而是与各个文化的历史、地理、宗教、哲学等因素紧密相连,深刻地反映了人类社会的文化观念和价值取向。通过对这些自然界中左右二元对立象征意义的研究,我们可以更深入地理解不同文化的独特内涵和人类对自然与世界的认知方式。

2.2 服饰穿戴中的左右象征

服饰左右区隔作为身体符号实践核心,是社会分类系统的物质载体。中国古代衣冠制度中,右衽、左衽的二元划分超越服饰形制,成为族群认同符号。其意义建构基于华夏中心主义认知范式,通过礼仪规训,右衽被赋予文明含义,成为儒家礼治秩序的具身表达。《论语》中“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将左衽标定为“他者符号”,构建汉夷二元对立边界。

前现代时期的符号权力运作右衽作为文化正统象征,其认同功能依赖礼制传播网络。朝贡体系下,周边族群对右衽的采纳是对中原符号资本的认同;左衽常与军事征服关联,凸显服饰的政治规训功能。现代性语境中符号解域与重构当代服饰左右象征呈现符号泛化:商务场景中左手腕表佩戴体现工业文明时间观的具身化;西方婚礼左手戒指习俗源于体液论身体观,是浪漫爱意识形态的符号表现。

物质文化视角下的符号分层服饰左右区隔,遵循布迪厄“区隔理论”,古代右衽的礼仪准入功能通过身体边界控制实现文化资本再生产。社会表征理论的跨时空比较右

衽从族群认同符号向国家礼仪符号的演变,反映中央集权化中服饰政治化;现代服饰选择自由度提升与个体化社会下身体主权观念兴起相关。

2.3 社会结构与身份地位的象征

左右象征作为社会分层的表现符号,构成了等级秩序的空间化表达。中国古代宫廷礼仪中,左右站位制度是宗法等等级制的空间符号实践。《史记》“位在廉颇之右”,通过礼仪神圣化机制,将官僚体系科层制结构转化为可见的权力图谱。宗庙祭祀中主祭者居左,体现“左阳右阴”宇宙观,实现政治权威合法化。

中原王朝一直遵循的是以左为尊的传统。汉代起“左为上”礼仪规则与儒家阴阳哲学绑定,朝堂左列公卿优先权,经朝会议轨内化为集体记忆,形成“左文右武”职官配置模型。中世纪欧洲宫廷右位神圣化源于基督教身体神学,通过加冕礼等仪式建构神授权力具身场域,宫廷舞中右领舞成为传统。

当代社交礼仪中,左右象征呈现传统符号现代转译:商务宴请右尊惯例源于西方礼仪霸权,形成全球商业通用符号;会议主席台中右优先模式时权威结构的缩影,强化核心象征资本,反映现代身份政治中的激烈竞争。

3 跨文化视角下的左右二元对立

左右二元对立象征体系的差异化建构,本质上是历史权力话语与符号传统长期互构的产物。在中国传统社会,儒家思想作为文化霸权的核心载体,通过礼制规训将“左尊右卑”秩序嵌入宗法等等级制符号系统。《周礼》确立的“左文右武”空间配置范式,经历代礼仪实践的反复操演与强化,逐渐内化为社会集体记忆,成为华夏文明认同的重要标识。反观西方基督教文化,神学话语通过宗教仪轨将“右”神圣化,“上帝右手”的隐喻在加冕礼、圣餐仪式等重要宗教实践中不断被强化,进而构建起神权等级制的符号表征体系。这种历时性的符号建构过程,使左右象征成为文化基因,持续形塑着不同社会的认知模式与行为规范。

地理环境作为文化建构的生态基础,通过影响生计模式间接塑造左右象征体系。在农耕文明语境下,中国先民基于阴阳五行关联性思维,将太阳东升,东方属阳与春季播种、生命萌发等自然现象相联结,形成“东方-阳气-新生”的符号链;西方属阴的认知则与秋收冬藏的自然节律形成符号同构。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游牧文化与海洋文明更强调空间方位的实用价值。例如,航海民族基于右舷航行传统,将右舷与安全航线、顺利航行建立紧密的符号关联。这种生态适应性符号化过程,充分体现了地理

环境对文化认知的物质性制约作用。

左右二元对立作为文化符号系统的重要表现,是解析文化意义生产机制的关键密钥。通过解构性符号对左右、神圣或世俗的象征关联网络,可透视宇宙观、权力结构与意识形态的深层架构。运用福柯式谱系学方法,追溯左右象征从传统社会到全球化时代的符号嬗变轨迹,关注全球化进程中文化权力关系对左右象征的影响,警惕西方中心主义在符号传播中的隐性渗透。这种基于文化唯物主义与后现代符号理论的交叉研究,不仅有助于揭示左右象征差异的深层动因,更为理解全球化时代的文化多样性提供了新的理论参照。

参考文献:

[1] 罗伯特·赫尔兹. 死亡与右手[M].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511. 112.

[2] 列维-斯特劳斯传[M]. (法) 贝多莱,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

[3] 钟年. 置于时空流中的自然崇拜——《中国自然神与自然崇拜》读后[J]. 民族研究, 1994(02): 61-63.

[4] 吴凤玲. 赫尔兹和他的《死亡与右手》[J].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7(05): 44-48.

[5] 葛兰言, 刘文玲. 葛兰言论中国人的思维——《中国人的思维》导言[J]. 文化学刊, 2014(04): 104-116.

[6] 张应峰. “周人尚左”与“右手的优越”——中国古代分类体系的人类学解释[J]. 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0, 55(06): 125-129.

作者简介: 王婷婷(2002.02-), 女, 汉族, 陕西汉中, 硕士研究生在读, 研究方向: 民族学。